



渠川

几次拜访老作家渠川先生,听他讲“陈年往事”,诸多文友浮上他的心头,其中有被他称之为“贵人”的赵寰、断言他“大器晚成”的王愿坚和彼此“无话不谈”的陈广生。在漫长的岁月里,他们曾经并肩走过时而风和日丽、时而暴风骤雨的道路,他们的深厚友谊和个人命运,总是与国家、与时代分不开。

### 渠川与赵寰

中国有句老话叫“贵人相助”,赵寰既是渠川的学长,还是他生命中的贵人。渠川与赵寰初识于1948年,当时他们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。燕京大学由司徒雷登创建,燕园内名师云集,渠川却因家境贫寒而困难重重,第一学期以优异的成绩争取到甲等救济金,免去了学宿费,但伙食费没有着落,只能借钱天天喝白菜汤,第二个学期的费用又成了大问题。寒假里,他回老家天津找同学求熟人介绍工作赚点钱,却总是找不到事做,于是,他就去天津的高中校友会演话剧,排戏时有饭吃。渠川在排戏时遇到几位燕大学生,其中一位高班女同学认为他演得好,寒假过后回校,女同学就把他介绍给燕大的燕剧社。

成立于1945年的燕剧社是燕大学生课外演剧团体,渠川在剧社里认识了许多高班同学,其中就有赵寰。赵寰比渠川大4岁,高两班,奉天安东(今辽宁丹东)人。他高大俊秀,胆识超群,戴美国兵的布帽子,穿高帮靴子,走路双手紧握拳头迈大步,如葱葱杨树清新而蓬勃,俩人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。赵寰在燕剧社导戏,要排《白毛女》,让渠川演黄世仁。渠川小时候跟父亲学过京剧,一些经典京剧熟记于心,而《白毛女》是歌剧,一个现代戏,渠川演起来不太习惯,要求换到次要的角色。赵寰不同意,说渠川在舞台上就是个“人物”,要承担主要角色,还说:“以后我写戏,非把你写进去不可。”《白毛女》排了一段时间,被华北学联劝阻停止排演了。燕剧社要成立“七人领导小组”,赵寰帮助渠川进了“领导班子”,负责生活福利方面的工作。赵寰想把渠川培养成燕剧社的接班人,待他们这批高班学生毕业后就把剧社交给他。就这样,两个年轻茁壮的生命,开始了纯真的友谊和心灵的碰撞。

1948年暑假里的8月19日,发生了两件大事。一是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,开始改发金圆券;一是国民党在全国大批逮捕进步学生,渠川的好些同学事先得到消息,去了解放区,包括赵寰。这事对渠川震动很大,尽管当时国民党溃败的消息被严密封锁,生性敏感的他强烈地感受到黎明即将到来的讯息,他对解放区产生了憧憬,也不想念书了,想到解放区去,在那里有工作可做,不用为学费生活费苦恼。到了学校开学时,赵寰又从解放区回来了,他虽然不是地下党员,却接受了党的任务回校。那天晚上,渠川与赵寰在房间里彻夜长谈,最后赵寰答应把渠川送到解放区去,但不是马上就走,得先一起排出一个戏来。

赵寰把屠格涅夫的小说《罗亭》改编成话剧,渠川出演男二号列兹涅夫,是一个沉稳、干练、务实的形象,和男一号罗亭虚伪、浮夸、张扬的性格形成鲜明对比。剧作中有“不要做言语的巨人,行动的矮子”的名句,赵寰想借此尖锐嘲讽和批评那些话说得漂亮、斗争起来却很怯懦的大学生。列兹涅夫的个性与渠川不同,他觉得难演,由于大家默契,排练和演出都很成功。完成演出是1948年12月12日,这时,大学生去解放区已很风行,形成了“好男儿都去解放区”的风气。

12月13日,赵寰与渠川一起推着车,把借来的道具一一还掉。到了晚上,燕大的校园像浸泡在黑色的墨水里,赵寰把渠川带到操场边的一棵丁香树下,树下已站着一位新闻系的姓刘的同学。赵寰说:“你们俩明天早晨一起去天津,再由天津往郊外一个叫潘庄的地方走,到潘庄找一个姓董的,他会带你们去冀东解放区,我还有任务,就不陪同了,刘同学的暗号叫C1,渠同学的暗号叫C2。”

严冬的清晨虽是寒风刺骨,阳光还是冲破了黑夜给大地带来了曙光。渠川与刘同学一大早就坐燕大的班车到北京火车站,买了车票去天津。他们到了天津才知道,天津已被解放军包围,形势很紧张,那一趟车之后,北京与天津的铁路交通就中断了。他们在天津待了一天,第二天上午穿起长棉袍、皮鞋,以大学生到乡下看亲戚为借口,冒险到了潘庄,找到了姓董的。俩人把暗号一说,姓董的就知道是赵寰介绍来的,带他们到冀东解放区去。解放区很欢迎大学生,也很需要他们,渠川到了冀东军区城工部,后转到第四十军政治部新华社当记者。

1955年“肃反”运动开始,组织对渠川进行调查,派人向赵寰了解情况,赵寰写下了14页多字的“材料”。其中写道:“我和他(指渠川)关系比较密切,我认为他在演戏上有出息,劝他以搞戏为职业。”赵寰回忆,渠川参加的演出有《大江流日夜》《夜歌》等话剧。“没有见到他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。”

渠川说:我与赵寰各自参军后,联系就少了,我参加解放海南岛、抗美援朝,他到了部队还是执著于写作排戏。他与董存瑞是同一个部队东北野战军,不过他参军时,董存瑞已经牺牲了,他把董存瑞舍身炸碉堡的事迹写成了歌剧《董存瑞》,1952年,在第四野战军文艺检阅大会上获戏剧类一等奖,我的小说《一心向党》获文学类三

# 听渠川忆文友

□曹凌云

等奖,歌曲一等奖是《我是一个兵》。我与赵寰在获奖名单上“碰上”了。《解放军报》刊登了获奖名单,我那时在朝鲜战场上,看到了,本想把获奖名单剪下来留着,可有点不好意思,后来我还托赵寰到四野找旧报纸,没有找到。赵寰还参与了电影《董存瑞》的创作,1955年上映,感动了千千万万观众,他的大名传遍了全国。他还与人合作创作小说《董存瑞的故事》,因为有两个剧本打底,写得驾轻就熟,但在文字间依然能感受到作者的激动,也能感染读者。

1962年春夏之交,在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担任创作组长的赵寰来到北京,向部队传达同年3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老总在广州召开的有关会议上的讲话精神。那时,渠川在北京参与编辑《星火燎原》,知音之交久别重逢,自然兴奋不已,彼此的表情和动作还是记忆中的模样,但渠川明显地感觉到眼前的赵寰已不是燕剧社里的那个赵寰了,当年青春的面容已是沟壑纵横,沧桑无限,他无疑在长期紧绷的政治氛围中心神不安,在政治运动中遭受过侵犯和磨难。特务,这不是笑话吗?渠川问他什么时候入党?他说:我到解放区时就算入党了。渠川问他还想创作什么?他说:还想写战争题材的剧本。

与许多文化人一样,赵寰在“文革”中被彻底打倒,因他的剧作和言论被打成“反革命”,投入监狱8年。他忍受一切苦难,却始终锲而不舍地行走在文艺创作的道路上,他珍惜属于他的每日每夜,在牢房里不能写作,就忘我地读书,他把马列著作通读了几遍。从监狱出来后的一段时间里,他体质孱弱,腿脚患病,不能走路,却继续着文学征途,创作了话剧剧本《南海长城》《秋收霹雳》等。

1984年,沿海14个城市开放,在温州文化部门工作的渠川参加了温州考察团前往北京取经,下榻广州市委招待所,有工作人员告诉渠川:外面有人找你。渠川出去一看,是赵寰,他是坐汽车来的。赵寰的身体已经恢复健康,政治问题也早已平反,担任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团长。两人紧紧拥抱,喜悦之情溢于言表,他们一起吃饭喝酒,喝咖啡聊天,回忆过往。赵寰精神矍铄,满面红光,他说:我兄弟姐妹很多,我9岁时,父亲带着我从老家丹东来到关内,让我在北京念书,考上燕京大学……

赵寰先生今年95岁,居住在他所钟爱的广州;渠川先生今年91岁,居住在他的第二故乡温州,两位老人享受生命的晚霞时光。过年过节,他们会通电话,互相问候,说起往事,记忆犹新,没有半句不满和抱怨,仿佛能看到对方带着愉悦微笑的脸。

### 渠川与王愿坚

1960年4月,渠川从沈阳军区调到总政《星火燎原》编辑部,编辑部约50人,下分小组,渠川所在的小组有10来人,办公和住宿都在北京西山的中国作协创作基地。《星火燎原》是一部革命回忆录选集,渠川在编辑过程中,较为系统地接触到党和军队的历史,以及许多革命家讲述的人生故事。

小组里有一位作家叫王愿坚,山东诸城人,1944年参加革命,解放战争时在华东野战军当记者,1952年到《解放军文艺》任编辑,创作了报告文学《东山岛》、小说《党费》《粮食的故事》等,备受读者称赞和文坛瞩目。渠川也早知王愿坚的大名,见他品貌不凡,有儒将风范,想主动与他交往时,他被上级派去陪同一位来中国采风的海外作家。这样,王愿坚的房间空了出来,正好与渠川同住的编辑来了妻子,渠川就住到王愿坚的房间里。

王愿坚完成了陪同任务回到编辑部,与渠川同住一个房间,共用一个水龙头,很快就熟悉起来。他俩同岁,有相同经历,成长观、文学观和价值观也相近,有很多共同语言。渠川觉得王愿坚是那种先天的优秀,聪明能干、记忆力强、视野开阔,就把自己的一些文学作品拿给他指点。追溯起来,渠川接触文学比王愿坚更早,上高中时就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,写了10多篇短小说投给报纸并发表;参军后,他创作的小说《一心向党》在《人民文学》上亮相,并入选多部集子。但接下来由于工作原因,他偏离了写作轨道。王愿坚看了渠川的作品,认为主题富有时代色彩,文笔洗练从容,在文学性上大有可圈可点之处。

1960年12月,西山上冬雪纷飞,银装素裹,山上的编辑小组集体下山,住到北京市内总参第三招待所。《星火燎原》编辑部重新编小组,渠川和王愿坚还在一个小组,王愿坚为组长。组里的同志率真本色,工作时一起切磋、研讨,解决问题,休息时一起打扑克“赶猪”,很是热闹。不久,王愿坚在北京安了家,逢星期天,王愿坚不时请渠川到家里吃一餐。新婚不久的渠川与妻子两地分居,妻子在遥远的温州,他的内心深处是孤寂和苦涩的,他珍惜王愿坚等好友带给他的温暖与快乐。

不过,编辑部里也有人对渠川有看法,说他在文学道路上走不远。在一次会议上,有人说渠川虚张声势,没有作品。王愿坚说:我认为渠川有潜力,将来肯定能写出好作品。那人不服气地说:说话要有根据。王愿坚说:我坚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,我断言渠川大器晚成。那人说:大器晚成这个成语是有的,可真正大器晚成的人很少见。

1970年1月,渠川经过多方努力,终于结束了与妻子两地分居的日子,调到温州工作。1973年,渠川出差北京,找到王愿坚。10年没有见面,经过政治运动的俩人都难掩岁月留下的斑驳,但还是走过了,相见自然高兴。王愿坚热情接待渠川,拉到家里吃饭、喝酒、聊天,醉意朦胧中好像回到那久违的编辑部生涯。席间,王愿坚说自己应八一电影制片厂邀请,正在与剧作家陆柱国合作,将李心田的小说《闪闪的红星》改编成同名电影剧本,塑造了30年代潘东子向往参加革命的红孩子形象。次年《闪闪的红星》上映了,成了一部家喻户晓的优秀儿童片,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最著名的影片之一,伴随着一代人成长。

渠川先生说:王愿坚的小说和剧本大多取材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生活,他善于捕捉典型人物,表现英雄人物的崇高精神,构思巧妙、故事性强,容易与读者、观众发生互动、共鸣。1977年渠川再次到北京出差,去看望王愿坚,他依

然处在创作的旺盛期,连续写了10多个以长征为题材的短篇。这时,他的生活条件改善了,住在一栋有院子的房子里。他呼朋唤友,摆起酒菜,欢迎渠川。老友们大口喝酒,大声说话,亲如兄弟,笑声朗朗。他爱人翁亚妮过来:你们小声点,隔壁外交部宿舍里的人在睡午觉呢。翁亚妮是宁波人,也是一位军人,他们爱得纯粹而真挚。

王愿坚相信渠川一定能写出好作品来,每次见面,他总对渠川说:“你不要老说创作计划,你要动笔呀,你大胆地写。”上世纪80年代,在温州文化部门工作的渠川拿起笔杆创作文学作品,1989年3月,他完成了长篇小说《金魔》,第二年7月由海峡出版社出版,获得华东优秀文艺图书评比一等奖,1994年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《昌晋源票号》,获中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。

令渠川悲痛的是,王愿坚没能分享到他成功的喜悦,《金魔》出版后不久,王愿坚就病逝于北京,他没能看到这部部长篇小说,更不知道改编的电视剧大获成功。渠川感激王愿坚一直以来的鼓励,断言他“大器晚成”。渠川60岁才写出《金魔》,79岁才写出第二部长篇《官痛》,看似大器晚成,但渠川不认为自己是大器晚成。在文学创作上,他年轻时就“冒头”了,只不过长时间里受到各方面拖累,没有机会创作罢了,但他始终视文学为信仰,文学是他精神世界的栖身地,他没有与文学分离,只是在等待和迎接文学创作的“燃点”,来“证实”王愿坚对他的断言。

### 渠川与陈广生

陈广生的文学创作始终围绕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——雷锋,1964年,他也因此从沈阳军区工兵团俱乐部调到沈阳军区文化部创作组。创作组共有6人,组长是著名军旅作家崔家骏,创作组有电影剧本《上甘岭》(合作)等。那一年,渠川在采写刘英俊的英雄事迹,陈广生继续写雷锋的故事,他们互相讨教创作中的困惑,也时常分享阅读过的经典作品,一致认为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是法国的莫泊桑、俄罗斯的契诃夫、美国的欧·亨利和杰克·伦敦。

两年后,“文革”就开始了。沈阳军区办起学习班,下分小组,陈广生负责一个小组,任组长,创作组6人加上宣传部理论科、秘书处的同志,一共10人,都是笔杆子。学习班里人人自危,想尽办法保自己过关,要开展大批判,每人都要写材料,渠川初稿即成,陈广生看了很满意,就上报学习班,并让渠川代表小组在大会上发言,他用北京话宣读文稿,京腔悦耳,全场鸦雀无声。第二次大会发言,陈广生又让渠川上台。

陈广生刚强乐观,待人诚恳,对原则问题绝不含糊。渠川耿直热情,敢说敢做,对复杂问题敏于领悟。俩人成了互不设防、无话不谈的好朋友,建立了超常的友谊。陈广生说:我1931年出生在吉林长春一个平民家庭,家里不富裕,1948年5月,解放军进行长春围困战,我还在街上卖香卷。贫寒挡不住我革命的脚步,1949年我报名参军了,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。渠川也向陈广生畅谈自己的家底和历史。渠川还说:我高中三年,因为家穷学费没着落,高三时接受一位同学的邀请,一起办刊物,心想如果办起来,写稿能挣稿费,那年冬天,我与5位同学聚在一起商量杂志叫什么名字,最后商定为“钥匙”。为了解决出刊经费,我们去一个据说愿意出经费的人,见到后那人却说自己没有经费,后来我知道那人是中统天津运组组长李宗岳,我们也没有从其他渠道争取到经费,就不干了。陈广生听后追问了一句:这事最后没办成?渠川说:没办成。不料后来,小组里有人拿渠川参加“钥匙”一事做文章,要打倒渠川。陈广生说:这事情我清楚,最后没办成。调查渠川,事实清楚,没有办成,不成问题。

渠川在沈阳时居住在军区法院的一栋小楼里,吃饭要到政治部食堂,骑自行车要10多分钟。冬天里,他在小楼里写稿,外面下大雪,到了吃饭时间点,去不了食堂,又饥肠辘辘,他只得推开房门,迎着风雪踩着厚厚的积雪到附近陈广生家要吃的,陈广生的爱人赶忙烙饼炒鸡蛋给他吃。

1970年1月渠川复员到温州,离开部队那天,已任沈阳军区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的陈广生和3位战友请他吃了一顿中饭,送他到火车站。雪过天晴,火车站像穿着一件超大的白绒衫,车站里乘客很少,静谧得像是一个深沉的梦。

渠川说:“陈广生是写雷锋‘第一人’,他写雷锋纯粹是出于对雷锋的敬重和对文学的热爱,而非名利的考虑。”雷锋与陈广生关系不错,向陈广生借过《鲁迅小说选》,雷锋看完这本书后对陈广生说:我母亲和祥林嫂差不多。陈广生当时是团里的俱乐部主任,发现雷锋有文艺表演才能,就让他加入团战士业余演出队,并开始写雷锋苦难的童年和成长的经历。1962年8月15日,陈广生在写稿子时听到雷锋牺牲的消息,他忍着悲伤赶到抚顺参与操办雷锋的丧事,读到雷锋的8本日记手稿。这是陈广生写雷锋潜在的情感动力,他先后撰写17种体裁的几十本雷锋专著,广受读者关注,仅《雷锋的故事》一书,发行量就达2000多册,它们的生命力,来自作者的真情。陈广生满怀深情地写雷锋、讲雷锋、学雷锋、做雷锋。他曾担任全国100多所大中院校校外辅导员,作报告1000余场,让蕴含爱心的雷锋故事滋润无数的心灵。

渠川完成了《金魔》的创作与出版后,一身轻松,但沈阳军区的情结一直萦绕于心,挥之不去。1991年春夏之交,微风和畅,他特地去了沈阳,走一走沈阳军区,看一看陈广生等几位好战友。陈广生和几位战友住在干休所,见到渠川喜出望外,联合请他吃大餐喝啤酒。陈广生问:听说你写了个长篇?渠川答:是的,我回去后寄给你们。陈广生感叹:文学是一场真正的马拉松,不仅是对才华学识和生活积累的考验,更是对意志定力和身体健康的挑战。

2018年3月,陈广生因病在沈阳逝世。逝者已矣,生者当如斯。

笔者与渠川先生在客厅里聊天,窗外的阳光溜了进来,跳跃在我们的身上,倏忽又不辞而别。渠川先生回首自己90年的漫长岁月,回忆与诸多文友难忘的经历,回顾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与变迁,感慨万端。笔者写下了此文,致敬前辈、致敬历史、致敬时代。

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办理事,也顺带探访“现代作家书房”展。在瞻仰了巴金、老舍、艾青、臧克家等许多老作家的书房后,“九叶派”诗人王辛笛的书房吸引了我的视线。当我站在他的书房前,端详着他的遗像,得知他所捐献的藏书和文物具有旷世价值后,勾起了我近40年前和他相识相交的回忆。

那是1981年底,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大陆、香港、台湾三地文学家参加的“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研讨会”在香港举行。中国作家协会派出了历史上第一个去香港参会的“中国作家团”。团长是民国时期曾在香港达德学院担任过文学系主任、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诗人和文学理论家黄药眠,团员有唐弢、罗荪、柯灵、辛笛、丁景唐、田仲济、叶子铭、楼栖、林焕平、吴宏聪、理由和我。12月21日,当我们一行从红磡车站下车后,来自上海的“九叶派”诗人王辛笛,就成了会内会外最受关注的热门大陆作家。

王辛笛(1912—2004),笔名辛笛、心笛。江苏淮安人,民盟成员,毕业于清华大学,曾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英文系进修,历任光华大学、暨南大学教授,诗刊《民歌》主编,中华文艺协会候补理事,秘书,上海市财政局秘书科长等。曾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、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,第五、六届名誉委员等。1928年开始发表作品。195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著有诗集《珠贝集》《手掌集》《辛笛诗稿》《印象·花束》《听水吟集》等,书评散文集《夜读书记》等。那年,以辛笛为第一作者的《九叶集》诗选刚刚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(1981年7月版)。

辛笛一到香港便写了一首《香港,我来了》的自由体小诗,表达他离开香港多年后重回香港的感受:

香港,我来了!/阳光下有山水,/就可以有无数的高层建筑;/夜来辨不清是天上的繁星,/还是人间的灯火,/都是一样的灿烂可亲!/切梦刀到头来/会帮助我验取什么是高贵,/什么是卑微!/我真想再一次在薄扶林道上散步,/去看望一下当年的望舒;/我还分明记得/那时还在永别亭前/送葬人的路祭;/隐隐升起的是伤心的野哭!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

王辛笛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是《试谈四十年代上海新诗风貌》。在马临校长的夜宴会上,作为大会主席的周策纵(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,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)拿出了他的一张贺年卡送人,上面印了他亲笔写的《沙田杂诗之一》:“雨后山花出浴娇,远峰入水注皎皎,和烟坐陪松竹,沁翠清音与梦摇。”并在与会者的邀请下用湘音调唱诵了这首诗。辛笛当即和韵作了一首七绝回应他:“白首成诗韵最娇,此行一路梦红绡。且携山色湖光去,待与夫人双桨摇。”第二天,周策纵要回美国威斯康辛去,又作了一首《赠辛笛先生》诗赠辛笛:“扶苏九叶隔年春,掌上明珠洗暗尘,倘为生民诗可殉,楚骚端未共沉沦。”诗末附言:“中国现代文学会议席上,余光中教授与予本春秋责备者之义,对新诗人于四十年代末期后纷纷封笔,颇表惋惜。王辛笛先生以当时诗人为生民请命,献身革命事业为解。因成此诗,略当问难请益云尔。”周策纵1981年12月21日于香港。并注云:“《手掌集》乃辛笛四十年代诗集,《九叶集》则出版于1981年,亦四十年代所作也。”辛笛当场又回赠一首《戏为周策纵先生寄内》:“少壮离乡老大回,花开花落喜春回,自从分手航天去,日诵南华又几回。”(按:周夫人吴南华。)周策纵又有奉和诗一首《讽和辛笛诗人戏笔代我寄内之作》:“老妻召我逐年回,铁鸟匆匆海外回。十二金牌卅六计,走为上计且来回。”来香港参会的台湾诗人兼教授余光中,对辛笛的《手掌集》(上海群星公司1948年出版)里的诗作大加赞赏,在讲台上以抑扬顿挫的声调和有力的姿态